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

——林惠祥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9)01-0173-12

● 张先清 张云鹤

摘要: 作为现代中国大陆最早开展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 林惠祥在 1929、1935 年两次台湾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 不仅生动地展示了 20 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 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 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关键词: 林惠祥; 台湾原住民; 影像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86/j.cnki.62-1035/d.20190131.001

有关现代台湾原住民的田野调查, 中国学者当以林惠祥为最早, 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就指出, 林惠祥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始创”^[1]。林惠祥 1929、1935 年两次台湾田野调查之行, 不仅留下了现代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民族志报告, 而且也为后来的台湾族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丰富的民族标本资料^[2]。在现有早期台湾原住民族志资料部分中, 相较于文字记载而言, 影像资料要少得多, 尤其是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台湾原住民早期影像记录并不多见, 目前所能看到的主要是一部分日本学者及西方人所拍摄的影像记录^[3]。十分难得的是, 林惠祥的两次台湾田野调查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研究”(编号: 13&ZD143)的成果。

[收稿日期] 2018-09-16

[作者简介] 张先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电邮: xqz@xmu.edu.cn。

厦门 361005

张云鹤,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电邮: yunzhang@stu.xmu.edu.cn。

厦门 361005

西北民族研究

N.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9 年第 1 期(总第 100 期)

2019.No.1(Total No.100)

会生活的照片。这些极其珍贵的田野摄影资料,除了一部分收录到他所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中外,还有相当部分并没有公开发表过,而且很少为人所知。今人透过林惠祥的这部分台湾原住民影像作品,不仅可以感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同时也可从学术史上揭示第一代中国人类学者如何在田野工作中借助摄影这一视觉中介来呈现边陲族群文化的,并进而反思田野摄影与人类学家、族群文化展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人类学、摄影术与早期民族志摄影

照相机在19世纪中期的发明,与现代人类学的发展几乎同步,由此也给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尤其是20世纪初便携式照相机的出现,使得摄影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中越来越普遍。人类学家使用影像记录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面对的族群及其文化形态,而且也拍摄记录那些从田野中采集到的各类标本。可以说,摄影成为早期人类学调查凭借和必须掌握的一种收集、记录民族志资料的重要辅助手段^[4]。早期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的著名田野工作手册(*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就已经十分重视摄影的运用,并将之作为田野调查的一项基本技能^[5],其田野摄影方法也被当时的殖民地人类学调查广泛采用。曾经对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达曼岛民族志调查起到重要作用的英国殖民地官员马恩(E. H. Man)在其有关安达曼岛人的田野考察中就采用了上述皇家人类学会田野工作手册的摄影指导方法,拍摄了大量的安达曼岛人影像^[6]。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西方开展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无一不将摄影作为民族志资料搜集的辅助工具。例如1898年哈登(A.C. Haddon)所主持的著名的剑桥大学托雷斯海峡探险考察就开展了相当多的田野摄影工作^[7],而里弗斯(W.H.R. Rivers)在其后的托达人(the Todas)的研究中,也广泛使用了摄影来记录当地人的社会文化图景^[8]。

林惠祥开始对台湾原住民进行田野工作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候也是西方人类学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专业田野调查被放置在学科中心的位置,强调对研究对象社会结构文化进行精细的观察与分析,田野摄影作为民族志调查的一项必要内容而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人类学家除了试图利用摄影来展示文化的差异性之外,也为田野工作创造了一种民族志在场(ethnographic present)的证据。田野摄影作为一种提供可靠的科学资料的手段,与民族志研究者笔下的观察文本一样,成为建构民族志真实性(authenticity)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综观此时期的经典民族志作品,都把田野摄影作为一种展现他者文化事实的技艺^[9],甚至马林诺夫斯基还被认为是同时代在民族志文本中最频繁使用摄影插图的人类学家之一^[10]。

几乎与林惠祥赴台湾调查的同时,20世纪3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巴厘岛和新几内亚地区开展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民族志创新计划,其宗旨是探寻摄影与摄像如何能更好地发挥民族志的主要记录媒介功能。如前所述,此前人类学家已经开始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广泛运用摄影,但它基本上仍是作为一种民族志辅助角色而存在,发挥的是一种类似文化插图的功能,而米德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则开始创新地将摄影作为呈现民族志主题的首要记录设备^[11]。米德的摄影被认为是一种颠覆性的民族志记

录方式,因为在米德的民族志摄影实验中,田野摄影被视为一种能够有效地帮助分析、诠释研究者试图探寻的文化模式的核心手段。米德的民族志摄影实验在人类学学科史上是十分可贵的一种方法论探索,使得摄影能够超越民族志调查的辅助角色而成为田野工作的主体角色,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田野过程中摄影与民族志关系的思考。时至今日,随着影像技术的成熟化与视觉人类学的兴起,用多元视觉手段来记录文化已是当代人类学广为接受的一种方法,影像民族志也已蔚为潮流。

然而,在米德的田野摄影创新实验之前,与当代借助镜头来记录文化的视觉人类学家不同,早期的人类学家在拍摄研究对象时,显然秉持的是相对传统的观念与手法,由此使得这一时期的田野影像传递出的往往是一种带有古典人类学气息的意象,并成为凸显土著民族图式的“原始”资料。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寇蒂斯(Edward S. Curtis)的北美印第安人影像作品,它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用以探讨“消逝”的印第安族群文化的重要民族志资料。近年来,在殖民反思与文化表述的热潮中,有关西方之外世界的认识与描述成为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一个主题,西方如何表述他者抑或他者如何被西方表述,这类问题在萨义德《东方学》之后成为学术讨论的一个热门议题。由于相当多的早期人类学研究对象都是与西方世界相对应的所谓非西方族群,他们常常被视为是一类无法表述自己而只能被表述的对象,因此其被表述的过程就成为当代民族志分析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作为与殖民扩张和他者文化展示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影像自然而然地成为主要的研究资料。一些收藏早期人类学者在世界各地田野调查中拍摄的大量相片的重要人类学、民族学机构或博物馆,也越来越重视这部分民族志摄影资料的研究。如1984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在著名的卡鲁斯·古尔本堪基金会(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的资助下,开始整理、研究皇家人类学会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摄影收藏(photographic collection)^[12]。上述米德等人的巴厘岛土著人摄影也已经成为大洋洲人类学的重要考察内容^[13]。

摄影术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后,逐渐在社会上得到应用,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的工具。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的人类学者,显然林惠祥也十分重视摄影在田野工作中的运用,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学习过摄影术,一个典型的证据是我们在其留下的遗物中,发现有一册他学习摄影的手抄本,上面记录了有关摄影的专业知识与要点。而从其本人的摄影作品来看,质量也颇上乘。也许因为其擅长民族志摄影,1931年,当林惠祥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时,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曾在拜会时任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际,将其所主持的四川峡防少年义勇队在西南彝族地区所采集的一批民族标本赠送给民族学组作为研究和陈列展览的资料,林惠祥就被指派负责整理这一批珍贵的彝族标本。他对这些彝族标本加以一一摄影,撰写了《僇僇标本图说》一稿,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辑刊》上。从这部现代中国较早的西南彝族民族文物图像志上,我们可以看到林惠祥的田野标本摄影已经具备相当高超的水平。可以说,与上述西方早期人类学家一样,林惠祥作为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所开展的田野摄影,同样具有用镜头解构文化的时代意义。通过考察这样一个娴熟掌握摄影术的人类学家在台湾原住民村社的早期田野摄影工作,我们可以探讨台湾原住民族群景观是如何被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的镜头所呈现与建构的。

二、呈现“番族”景观

目前保存下来的林惠祥田野摄影集主要可分为东南亚、泉州、厦门及台湾等几个部分,其中东南亚部分是其1937—1945年流寓南洋期间在当地进行考古调查、采集石器的田野记录,涉及马来西亚的洞穴遗址等石器时代的遗址、石器标本等。这部分资料除了与其从事早期东南与东南亚考古研究有关之外,也与他此时期正开拓南洋民族研究的计划有关。而泉州部分则是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从事泉州考古田野调查活动时拍摄所得。有关厦门地区的摄影内容则多为当地海岛社会生活习俗的展示图片,尤其是渔民的生计与生活场景。他曾经对厦门的渔民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在田野调查中拍摄了不少当地渔民习俗的相片,涉及当地渔船样式、船居生活与渔民服饰等。由此可见,这些摄影作品与其个人一生的研究轨迹是相吻合的。

在林惠祥留下的这些众多影像作品中,有关台湾部分无疑是最为珍贵的资料。此类影像作品主要集中在台湾原住民文化方面,涉及了体质特征、聚落社会与物质文化等人类学核心议题,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台湾原住民的族群状况。显然,这部分摄影资料应该是其为撰写台湾原住民民族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而准备的。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番情概说”,中篇“标本图说”,下篇“游踪纪要”。全书一共插入了121幅照片,其中上篇10幅,中篇96幅,下篇15幅。在书的“凡例”中,林惠祥谈到了这三篇中的摄影插图来源问题:“三篇皆有插图,上篇采照相馆所摄,中篇在所内自制,下篇系出发中所摄。”^[14]也就是说,上篇关于台湾原住民概况的摄影主要从照相馆取得。林著上篇“番情概说”的10幅照片中,4幅系反映台湾中部、北部、南部等各族的体质样貌,其他6幅反映台湾各族的渔猎生计、习战及舞蹈艺术。换言之,这些照片并非林惠祥本人在田野中拍摄得来的,而是在照相馆翻拍的已有照片。从其后所附的参考书目来看,他可能翻拍了日本学者成田武司所著《台湾生蕃种族写真帖》、鸟居龙藏所著《人类学写真集:台湾红头屿》等书中的田野摄影照片^[15]。例如,在现存的摄影集中,有一幅底片即与《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番情概说”之“生业”部分所采用的两幅描述原住民狩猎射箭照片类似,也是一幅展示台湾原住民射箭情状的相片(见图1),有可能即是翻拍自上述日本学者的论著。



图1

除了上述上篇10幅照片之外,中篇、下篇共111幅照片则是他个人所摄。中篇是“标本图说”。1929年9月,林惠祥在完成首次台湾调查,返回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为了撰写书稿和筹备展览,他将此次采集到的一百余件台湾原住民文物逐一进行标本摄影与文字解说。而下篇则类似他的田野采集日志,其摄影集中最为珍贵的应该是这部分民族文物标本及田野考察摄影。而从目前这部分摄影作品来看,无论是台湾原住民文物标本摄影或田野摄影,都有相当大的部分并没有收录在他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中。例如,其摄影集



中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各类人物摄影不少于数十张,基本没有使用在上述《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中。至于标本照片,也有一些部分未收录在上述“标本图说”篇中。这些关于台湾原住民人物和族群物件的摄影,除了一部分是翻拍的已有照片之外,绝大多数应该都是他在此次田野调查现场拍摄以及其后整理田野标本所得,在考察早期中国人类学家的田野摄影及台湾原住民文化研究方面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据“游踪纪要”,我们可以得知林惠祥曾计划对当时被称为“番族”的泰雅、赛夏、布农、邹族、阿美、排湾、雅美等七族展开较为全面的调查。从其田野调查的行踪来看,他先是到了乌来社,调查泰雅族,然后赴另一个泰雅族村社角板山这一当时的“北番”进行原住民文化调查及标本采集。随后,他前往台东,赴卑南社、马兰社一带调查排湾族,并由此到新港哈拉巴宛社,调查阿美族。接着往台湾东北地区继续调查泰雅族。最后到中部日月潭村社调查布农族,在这里采集到他梦寐以求的独木舟与音乐杵。除了邹族、雅美族之外,他实地调查记录过的台湾原住民族属应该有五个^[16]。

在调查上述台湾原住民各族过程中,除了记录所观察到的社会文化习俗之外,他也采取田野摄影的方式以获取民族志影像资料。结合《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文本和其摄影集,我们可以发现其重点拍摄记录的地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原住民体质情况。在人类学早期阶段,体质是分类族群的重要标志,林惠祥第一次赴台湾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他受蔡元培所聘已担任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肩负发展民族学与采集民族标本的任务,故而他向蔡元培提议“欲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17],因此作为直观展示族群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台湾地区番族的体质特点应该就是他特别注意观察的地方。由于族属起源部分是同时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林惠祥尤其关注台湾原住民的各种差异化的体质特征,如肤色、发质、身长、头型等这类早期体质人类学区分人种的要素。通过直接的田野考察,他认为台湾原住民在族源上属于“马来种”,并生动地记载了自己初次接触原住民的观察印象:

余初见番人之面仿如重见菲律宾朋友;盖其黄褐色之面容,突出之眉棱骨,圆而大之马来眼,均与菲律宾人相类,而且言语之声调尤为相似^[18]。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伊能嘉矩、鸟居龙藏等日本学者曾经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专门的体质人类学调查,指出台湾原住民与南洋群岛马来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种观点对于林惠祥的台湾原住民族属认识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希望通过个人的田野观察对台湾原住民的族属作出学术判断。尽管他无法像上述鸟居龙藏等人一样进行比较深入的体质测量,但他也试图通过人像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他所观察到的台湾原住民人种特征。从他留下来的文字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十分注意拍摄记录原住民的样貌情况。例如,当他在台东做田野工作时,他就提到自己开展原住民人物摄影的经过:

余告横山君欲为番人照相,彼乃召集在家者数人,并皆穿着衣服佩刀携枪而至。余又请彼等邀妇女来,大都不肯,只有二人至。同来三友及所雇番人皆加入其

中。余摄一影毕,请福安君代摄,余则入队立于其位,亦摄一张^[19]。

这段为番人照相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中国人类学家为了取得原住民族的珍贵图像而进行田野摄影的情况。在其现存的田野摄影集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原住民人像摄影,甚至还有多张是他与番族的合照(见图2)。这种调查者与土著人之间对比鲜明的合影方式,曾在人类学学科史上引起了不少争论。例如 Satadru Sen 就批评 M. V. Portman 及其他西方人在安达曼岛人的田野摄影过程中有意将自身置于当地土著人合影的中心位置,体现了西方人的权力与文明至上的殖民色彩^[20]。当然,林惠祥的番族合影照,应该与上述 M. V. Portman 等人的做法具有不同的用意,其主要目的是试图提供观察台湾原住民体质特征的另一个参照角度。可以说,作为呈现“他者”文化的一个内容,原住民人像摄影在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曾是最主要的民族志方法之一,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特诺布里恩德岛,还是布朗在安达曼岛,以及其后普理查德关于赞德人、努尔人的研究,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以展示当地族群的形象。而林惠祥的这些早期台湾原住民人像摄影,无疑弥补了中国人类学学科史上的重要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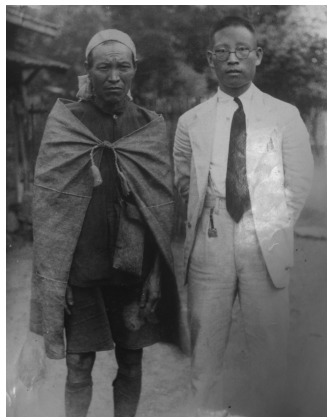


图2

此外,南岛语族的纹身习俗也是他重点拍摄的对象。如他在记录泰雅族的体质特征时,尤其注意当地的这种纹身习俗:

男女皆黥面为饰,故又称“黥面番”。男子自额至颌之中央作直纹;女子自口经两颊至两耳作横而斜之上阔纹,使口似有锐突之势,汉人称之为“乌鸦嘴”^[21]。

林惠祥关注台湾原住民的纹身习俗,主要是为探讨台湾原住民的起源问题,他力图通过纹身等所谓“文化特质”来考证台湾原住民与马来人等“南洋各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他的田野采集照片中,有多幅就是关于泰雅、排湾等族群的纹身习俗的特写(见图3)。在其后关于《世界人种志》的研究中,他也特别提到台湾原住民的纹身习俗^[22]。纹身是人类身体刻画的一种文化,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不少族群中都流行这种习俗。作为一种族群分类的边界符号,纹身引起早期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而且近年来随着人类学的身体讨论蓬勃发展,对于纹身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例如,特纳(Terence Turner)提出“社会皮肤”(social skin)的概念来体现巴西卡亚坡人的身体与自然观^[23]。而盖尔(Gell)针对波利尼西亚纹身习俗的研究指出,纹身使得身体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复数,身体所具有的额外组织和附加的自我意义因之得以被创造。林惠祥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这



图3

种纹身习俗的摄影也为我们分析南方族群的身体观留下了可贵的影像资料。

除了纹身等体质特征之外,他也十分关注台湾原住民的聚落社会情境,包括家屋与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家屋是他田野考察的重点之一,因此也是其摄影记录的一个内容。对于此次田野考察中观察到的各个原住民族群,他都分别记载了其聚落及其家屋形态。如泰雅族“家屋多散处,植竹木为柱,葺茅草为盖及壁,有于屋内穴地四五尺深而为半穴居者。仓谷最发达,自成一屋,下有支柱,屋底及支柱间隔以圆木板以防鼠害。”^[24]赛夏族“屋以粘板岩砌壁及顶”^[25]。阿美族“家屋皆相联结为集团,集团之外有公共之垣围之。屋内有间隔,有厨房、寝所、畜舍之分别。”^[26]排湾族“家屋以粘板岩及草木等为建筑料,屋内亦有间隔,有分别”^[27]。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摄影来记录这些观察到的聚落与家屋状况。例如他在前往中部日月潭调查时,一到日月潭水社,就拍摄了原住民的家屋:“行不久即抵番社,余为拍一照,此社即水社。湖面距海达 2400 呎。番屋约二三十,杂列于湖边,复有独木舟靠岸,余又摄一影。”^[28]《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中收录了四张家屋摄影,分别是卑南社两张、水社两张。而在目前留存的照片中,我们发现其实他还拍摄了多张家屋照片,其中包括赛夏族、排湾族的板岩屋等(见图 4)。这部分田野摄影,真实地再现了近一个世纪前的台湾原住民村社聚落与家屋样态。



图 4

此外,原住民的生计方式也是他重点关注的田野考察内容,他也用摄影的方式逐一加以记录。按照林惠祥的计划,这本《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的撰写初衷是要通过观察台湾原住民这一“现存未开民族之现状”,以“窥见人类文化史上之原始状态”^[29],因此有关采集、狩猎等反映“原始”生产性质的内容是他此次田野观察的重点之一,我们也不难理解他将反映“原始”形态的“番物”——原住民物件作为田野采集的主要对象^[30]。而相当多的田野摄影也是围绕这部分标本而展开的。我们发现,对于这些原住民物件标本,林惠祥一般很少在现场摄影,这一点从未发表的摄影集中也可看出来。其原因除了田野时间有限之外,也与这类族群标本摄影需要专门的场所有关。因此,除了比较大的静物如独木舟、音乐杵在现场拍摄之外,他主要采取的是将“番物”采集回研究所后一一编号、统一摄影的方式。这一点,与当时大多数人类学家田野采集的做法是一致的,这也是其书中提到的“所内自制”。而其标本摄影得到了当时同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任职的民族学家商承祖的帮助。从《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标本图说”可知,林惠祥将采集到的标本分为武器、衣服、货币及饰物、艺术品、娱乐品、宗教及仪式品、纪事绳、舟、石器时代遗物等十大类,除了第十类属于考古标本外,其他九类都属于台湾原住民物质文化标本,有 132 种之多。他对所有标本都进行了精心的摄影。比较现有的摄影集与原书插图,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例如,在“标本图说”第六项“娱乐品”中,他收入了“音乐杵”(编号:123),为长、中、短三件,他在书中以静态摄

影的方式来展示^[31]。根据其田野考察日志,我们可以得知其获取这一台湾中部原住民水社特有的生活乐器的详细田野经过。1929年9月15日,他在抵达日月潭水社后,即开始采集独木舟等当地物件,同时也特别注意到当地原住民的音乐杵这一特殊艺术物件:

此处尚有一种乐器,名音乐杵,形如番人捣物之杵,捣石上作铛铛之声。余请观之,并言欲买;彼等云全社只公有一套,不能卖。余固求之,乃选出三个,代表高中低三音。余请彼等敲成歌调,彼等云须请妇女为之,即唤集五人持所余之五杵敲于原来特设之坚石上。其音颇清越可听,若在夜间当更动(听)耳,惟调殊简单,余记得为 3532 123——……余又请彼等唱一歌,彼等亦首肯,余为记之于纸^[32]。

从上述田野笔记可知,林惠祥在采集音乐杵标本时十分注意记录物件的功能,为此他甚至要求物件持有者为其现场演奏,以实地观察物件在原住民生活中的角色并记录乐舞仪式。在其摄影集中,我们发现了多张类似的原住民表演音乐杵的现场照片(见图5),这部分照片不见于《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应该就是其在此次田野考察中拍摄的。很显然,与书籍中的静态标本摄影相比,这类在田野现场中拍摄的反映物件与原住民生活实践关系的照片,更为生动地展示了物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



图5

三、作为一种民族志的影像

在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田野标本采集往往和土著文化展示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同大多数专业人类学家一样,林惠祥在返回后也在上海福开森路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台湾原住民文化展览。这次展览影响较大,当时上海的《申报》副刊特别作了报道,内中也展示了不少林惠祥有关台湾番族的田野摄影图片,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近代报人胡惠生就谈到其在得知消息后,通过时任中研院长蔡元培的介绍,和其叔叔、民俗学家胡朴安一起去参观林惠祥的台湾番族文化标本的情况:

……现在听见林君采取了这一大批民族学上和考古学的大材料,安得而不冲动我的嗜欲!十一月十六日,得到了蔡子民院长一封介绍信。随朴安叔和持志大学几位同学,匆匆地前去参观了一次。承蒙林探漠君不以我的浅陋,复允许我在十一月二十三、四日两天,又连去细细研究过一番^[33]。

上文中的林探漠即是林惠祥。胡惠生后来撰写了一篇题为“参观台湾番族生活品标本

后”的观后感,连载在当时的《铁路周刊》上。有意思的是,他还特别请了同去参观的助手顾克俭帮忙,针对林惠祥展出的上述台湾原住民标本创作了 18 幅写生画,包括阿美族的鱼骨槩、布农族的鹿皮衣等,刊载在报纸上,由此提供了另外一个与林惠祥田野摄影异曲同工的关于台湾番族文化的视觉文本^[34]。

很显然,和实物展览一样,影像在建构族群景观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林惠祥的这些台湾摄影作品,展示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社会文化的实况。他在田野调查中采集的标本及所拍摄的相片,在其民族志及报刊上发表后,成为极具冲击力地呈现“他者”的视觉作品。当时一篇评论林著的书评指出,林氏“复跋涉穷荒,采集标本,一一摄影留说,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都为一册,凡数万言。文字之难显者,可借图说以显明,而图说之易见者,更可借文以引证。”^[35]这段文字精确地指出了林著民族志与田野摄影图文互映的特点。林著这一视觉文本所包含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上述摄影及文字交互的特点,无疑成功吸引了当时社会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注与兴趣。台湾被日本割占后,国人一直关注这一岛屿的命运。在林惠祥开展台湾研究的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也已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其侵华计划,中国处于存亡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湾原住民问题,实际上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牵动了社会大众的神经。在林惠祥的民族志出版及原住民文化展览举办之后,当时中国报刊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台湾原住民的摄影报道,成为其时国人认识台湾原住民之民族性的媒介。正如 Elizabeth Edwards 所指出的,随着影像在不同的机构语境下的呈现,其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即使原本为旅行式的田野考察作品,也可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展示。很显然,林惠祥的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及其展览活动,在推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台湾研究及有关台湾原住民的大众知识体系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学影像功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突出表现乃是影像本身已被视为一种文化书写的民族志。摄影并非是一种被动地呈现他者的方式,相反,影像被建构的方式往往就是民族志意义之所在^[36]。从一定意义上说,影像代表的是民族志工作者通过当地语言来表达的“本土视角”。在这样的知识脉络转换下,早期人类学影像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与分析研究,大英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牛津大学里弗斯博物馆保存的大量早期人类学影像资料,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目光。相比之下,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保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尤其是记录其民族志调查的资料却相对少见,也缺乏系统的保存与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林惠祥的台湾原住民影像作品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不仅因为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台湾原住族群的民族志资料价值,而且更因为作者本身就是一位本土人类学先驱,因此在分析中国的早期人类学摄影及影像民族志方面极具典型性。

林惠祥的田野摄影,对焦的是在他看来尚未文明化的族群——台湾番族。他继承的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类学的摄影风格,其摄影属于传统民族志时代颇为流行的“土著民族志”(salvage ethnography)摄影^[37]。在他的田野摄影活动中,从人像、聚落再到“番物”,展示的都是早期民族志中的核心要素,从而为影像民族志的分析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一手材料。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标本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人类学影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林惠祥所采集、拍摄的正是大量的台湾原住民标本,这些标本不止是静止的物件,还与台湾原住民民族的聚落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展示了这些物件在建构台湾原住民

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林惠祥的田野摄影与其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理解民族志及其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我们很难生动地体会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历程。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林惠祥的摄影集及民族志文本的内容,我们也可加深对早期中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志视角的理解。此外,经由林惠祥的这些田野摄影,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同时代中国与西方在人类学民族志摄影方面的学术境遇问题。

在早期民族志摄影中,米德夫妇的巴厘岛田野摄影实验无疑十分成功,他们拍摄了超过2.5万张照片和2.2万英尺的胶片。这种成功是基于许多有利条件的,他们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研究项目的支持,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设备,而且制订了周密的研究计划,时间充沛,整个拍摄从1936年3月持续到1938年3月,而且在1939年二三月间还作了大约六个星期专门针对巴厘岛人摄影记录的补充调查。此外,由于当地的巴厘岛属于西方殖民地,他们没有人身安全之虞。因此,我们从米德的田野摄影集中看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田野生活,处处呈现出一种安详的田野图景^[38]。

与此相反,林惠祥两次台湾原住民调查却常常面临不利的境地。他没有经费支持,完全是自费前往,也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他的田野日志中呈现的是一种充满危险的田野,例如,其在第一次即1929年赴台湾的原住民村社时这样写道:

该次调查番族采集标本之工作,余奋力以赴,不畏艰险,故能略有成就。盖台湾番族素有喜割人首之俗,故台人亦鲜有愿赴番地者。余一意向前,单身入番境,又无武器防身,幸得接近番界之台人予以助力^[39]。

尽管林惠祥得到当时日本警察的护送,但这种监视式的襄助,无疑更增加了他的忧惧,因此他根本无法长时间在田野点停留,甚至因为请求去兰屿而引起日本警察部门的怀疑,“派员跟踪调查”,导致最后无法成行,从而失去了对兰屿雅美族进行田野观察的宝贵机会^[40]。1935年暑假,他第二次自费去台湾调查,“再入番地,采买标本”。但船一抵达基隆,即遭日本水上警察严密查问,其他人都放行,唯独他被留置许久,最后只能由日本人派遣特务随行监视。他每次出门去采集标本,都要报告特务随行,如此几番方能成行。他自述在第二次两个星期的田野考察中,“受惊颇剧,与警探等勾心斗角甚苦”^[41]。寥寥数语,读来却可想象其田野过程中的惊心动魄。与林惠祥同时代的中国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也时常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但毕竟多数在国内地区,人身安全尚能得到一定保障,而不似林惠祥深入日人控制的台湾“番地”这般险象横生,因此其田野调查活动尤为可贵。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林惠祥的两次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总计只能持续匆匆数月,又怎能与上述米德夫妇在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支持下长达三年之久的田野摄影相比?更遑论此时期的西方人类学摄影已经在技术与方法论上有了长足的进展。

正因为如此,林惠祥的田野摄影反而具有Elizabeth Edward所说的原生类型田野摄影性质,而与前述寇蒂斯、米德等人“合作的摄影”不同——在这种“合作摄影”过程中,田野工作者为了获取满意的影像,常常要求研究对象和其密切配合,甚至反复拍摄。这种合作式的田野摄影,虽然能够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视觉效果或“奇异”的文化图像,某种程度上也有



助于深度的文化洞察,但存在一种典型的地方代理人的展演行为痕迹,正如 Aaron Glass 在研究寇蒂斯未发表的关于夸库扣特人的摄影时所指出的,其做法显然影响了族群文化的真实性^[42]。再以原住民人像摄影为例,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人类学界已经开始使用一种人体测量摄影方式来记录所谓的“土著人种”资料,尽管林惠祥无法像同时代的鸟居龙藏等人一样在台湾原住民间进行这方面的摄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原生类型田野摄影也保留了难得的文化真实感,他的影像就如 Elizabeth Edwards 所说的,是一种超出了图像本身的摄影。尽管受到时代的限制,林惠祥无法取得米德夫妇那样的条件,在台湾原住民地区作更为深度的田野摄影并记录原住民族文化,但显然他也作出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影像民族志的可贵尝试,他的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就如 Ira Jacknis 对米德在巴厘岛和新几内亚的田野摄影民族志工作的评价一样,历久之后成为一种经典。

四、结 语

可以说,林惠祥的田野摄影,与他毕生所倡导的一个重要研究构想即“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这一学术概念所涵盖的东南越人族群、台湾原住民与南洋族群之间围绕着海洋所发生的紧密文化联系息息相关。这一点此处暂时不加展开。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而言,影像的解读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当前人类学对于影像功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影像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表述与诠释民族志的资料。林惠祥这些尚未被人们广泛认识的田野摄影作品,将一个岛屿的原住族群原本隐蔽的社会生活以一种影像特有的生动感展示出来,不仅保存了上个世纪初珍贵的台湾族群景观,而且也进一步引发人们思考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林氏的这些影像作品,除了充分阐明和彰显了民族志的目标之外,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作为个体的人类学家的思想。作为视觉人类学的重要资料,它提醒我们注意到本土的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与早期人类学家田野采集过程中采集到的丰富标本一样,他们所拍摄的影像也是记录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些都是见证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的珍贵遗产。如今伴随着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这些影像也经历了从一个静态到动态的文化位移。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林惠祥的这类台湾田野民族志影像,作为一种诠释“他者”的文化符号,意味深长。

参考文献:

- [1] 李亦园.林惠祥的人类学贡献[J].东南学术,1998,(5):28.
- [2] 郭志超.开辟荆榛: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C]//载汪毅夫,郭志超主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193-201;陈建樾.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J].民族研究,2011,(4):25-33;贾益.林惠祥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及其民族意识[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6):77-82.
- [3] 宋文莹.跨越世纪的影像:鸟居龙藏眼中的台湾原住民[M].台北:顺益博物馆,1994.
- [4]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田野调查技术手册[M].何国强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43-247.
- [6] Elizabeth Edwards, "Science Visualized: E.H. Man in the Andaman Islands",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pp.108-121.

- [7] Edwards Edwards, *Raw Histories: Photographs, Anthropology and Museums*. Oxford, NY: Berg, 2001.
- [8] Paul Hockings, "The yellow bough: Rivers's use of photograph in The Todas".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pp.179-186.
- [9] Bronislaw Malinowski, Michael W. Young, *Malinowski's Kiriwina: Fieldwork Photography 1915-191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A. R. Radcliffe 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22.
- [10] Samain E. *Bronislaw Malinowski et la photographie anthropologique*. Vethnographie, 1995.
- [11] Ira Jacknis, "Margaret Mead and Gregory Bateson in Bali: Their Use of Photography and Film",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2 (May, 1988), pp. 160-177.
- [12] Elizabeth Edwards, "Foreword", VII,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3] Gregory Bateson and Margaret Mead: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The Academy of Science, 1942.
- [14][15][16][17][18][19][21][24][25][26][27][28][29][31][32] 林惠祥.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C]//蒋炳钊等编. 林惠祥文集(上).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33.56.98-110.6.34.104.37.37.38.39.39.108-109.33.85.109.
- [20] Satadru Sen, "Savage Bodies, Civilized Pleasures: M.V. Portman and the Andamanes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36, No.2(May, 2009), pp.366-368.
- [22] 林惠祥. 世界人种志[C]//蒋炳钊等编. 林惠祥文集(上).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160.
- [23] Turner, T.S., *Not Work Alone: A Cross-Cultural View of Activities Superfluous to Survival*.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pp.112-140.
- [30] 张先清. 物件的文化: 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J]. 民族学刊, 2016, (1): 1-7.
- [33][34] 胡惠生. 参观台湾番族生活品标本后[J]. 铁路周刊, 1930, (11, 12-13).
- [35] 顾天枢. 介绍林惠祥编: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J]. 边疆, 1939, 2(3-4).
- [36][37]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introduction", p.8.p.10.
- [38] Gregory Bateson and Margaret Mead: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1942.
- [39][40][41] 林惠祥. 二十五年之秘密[C]//蒋炳钊等编. 林惠祥文集(上).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7.
- [42] Aaron Glass, A Cannibal in the Archive: "Performance, Materiality, and (In) Visibility in Unpublished Edward Curtis Photographs of the Kwakwaka'wakw Hamat'sa",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Vol.25, Issue 2 (2009), pp.128-149.

(责任编辑: 哈 德)